

Mc
Graw
Hill
Education

WHO RULES AMERICA? 公司富豪
的胜利

原书第7版 Seventh Edition

谁统治美国? ★

The Triumph of the Corporate Rich

[美] G.威廉·多姆霍夫 —— 著 杨晓婧 —— 译

谁统治美国？

WHO RULES AMERICA ?

公司富豪的胜利

原书第7版

[美]G.威廉·多姆霍夫——著

杨晓婧——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7-5100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The Triumph of the Corporate Rich, 7e
ISBN: 0078026717
Copyright © 2014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Copyright © 2017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销售。

版权 ©2017 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所有。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Education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统治美国? : 公司富豪的胜利 : 原书第7版 / (美) G. 威廉·多姆霍夫 (G. William Domhoff) 著 ; 杨晓婧译.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35-9420-2

I. ①谁… II. ①G… ②杨… III. ①政治—研究—美国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3858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杨芳州
出版统筹 张颖
责任编辑 孙嘉琪
装帧设计 马晓羽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0.5
版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9420-2
定价 48.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94200001

序 言

经过全面修订，新版《谁统治美国？》记录了美国在 21 世纪前十二年中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全貌。这些变化更可以说是代表了公司富豪的胜利，他们拥有并掌控着能够支配美国经济和政府的少数几家大型银行、公司、农业综合企业以及商业地产机构。新版借鉴了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为公共利益团体和政府机构工作的专家所做的最新研究，以更新与公司关联¹、社交俱乐部、私立学校以及其他增强精英社会凝聚力的机构的有关信息。新版还包含了免税慈善机构、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的新资料，诠释了公司富豪如何通过这些组织来力图塑造公共政策。

公司和基金会与智库、政策研讨团体以及舆论塑造机构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为更新拓展相关数据，新版《谁统治美国？》参考了《基金会在线名录》，因其汇编的资助信息极具价值。本书提供了基于公众舆论调查的新证据，更充分地证明了一个长期分裂的状态：中低收入阶层美国人在各种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上偏好自由主义政策，而华盛顿联邦政府却对此置若罔闻。

基于对档案记录的最新研究，本版更加详细地解释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公司共同体内部的温和保守派为何在一些关键经济问题上变得更加保守，这为里根上台以及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持

¹ “公司关联”（corporate interlocks）是指由于大公司董事直接或间接地交叉任职而形成的公司间网络关系。——译者注

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创造了条件。本书还解释了民权运动的兴起和自由派 - 劳工联盟内部的分裂如何在无意间使更为团结的公司富豪出现右倾趋势。

新版援引 2006 年和 2008 年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取代共和党的案例，以及贝拉克·奥巴马 2008 年和 2012 年总统竞选的案例，证明了公众对政治决策的不满可以通过选举体现出来。本书还关注了因法院决议和竞选资金法律漏洞造成的竞选资金的急剧增长，公司富豪由此能够以匿名方式为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数十亿的捐赠用以投放攻击性广告。何况在过去，公司富豪针对限制竞选捐款、要求捐款更加公开透明的规定，总能找到相应的规避对策，在 2010 年和 2012 年的选举中，竞选资金甚至达到了天文数字的高度。

理论辩论赋予社会科学文献以活力，为了使那些没有此方面背景知识的读者拥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所有关于替代性理论的讨论都被放到了本书新增的最后一章，以便读者观察经验性论证如何展开，且不会为任何可能令人困惑或分心的简要评价所干扰。这一变化还能够使读者更好地对理论争议做出自己的判断，因为在那时他们已经对经验性图景有了全面的了解。此外，读者——以及教师——即便是略过最后一章也不会错失前八章呈现的论点和证据。

同以前一样，本书还设有专门的辅助网站（whorulesamerica.net）。读者可以在该网站阅读到许多在线文章和章节，网站还链接着一些方法论方面的工具。本书在相应位置对网站上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标注，以便提醒读者，在这些议题上他们还能获得更加深入的补充材料。网站上一篇文章就“财富、收入和权力”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而且定期更新资料。该网站还包含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进行权力结构研究的方法学信息，以及上层阶级身份的社会指标清单，这一清单对研究位于成年人口前 0.3%—0.5%、构成了社会中上层阶级的群体极有帮助。将这些资料从书中转移到网站上，可以帮助那些有志于进一步进行研究的人们了解

到研究方法的更多细节，同时为实体书留出更多的空间以讨论相关的重要议题，这些讨论将给初次涉足权力领域的读者带来直接的益处。

此前版本中针对 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和《国家劳工关系法案》的详细讨论也被挪到了网站上，这使我们能够对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案的起源、实施和效果进行深入的历史论述，同时还可以对 20 世纪 40 年代到 2010 年之间力图扩充或废除这些法案的斗争进行探讨。这一变化使本书能够更多地关注近期发生的事件，比如国会 2009—2010 年度会期中自由派 - 劳工联盟在推动立法上遭遇的失利。

几十年前，与上层阶级有关的资料远远多于公司共同体的信息。而现在这一情况却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一方面是因为从网上能够获取到越来越多与公司相关的讯息，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富豪越来越不愿在《美国名人录》以及其他资料中公布他们的私立学校和社交俱乐部信息。因此，有必要比以往版本更加着重地强调，实质上，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是硬币的正反面，所以在表述公司和阶级之间基本的统一性时，不应强调上层阶级成员“控制”公司共同体，而应更多地使用“公司富豪”这一概念。

此外，在讨论上层阶级与权力的关系时，应重点关注公司富豪内部的社会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因他们参与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社会机制而产生，如预科学校、排外的社交俱乐部、成人礼舞会以及精英聚会等。在这一点上，新版本依旧强调：通过对新贵及其子女的社会化，上层阶级的社会机制在权力平衡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将骄傲和优越感灌输给公司富豪的成员，同时培养普通公民顺从的意识。

第七版对关键词也略微做了调整。我将竞选领域的两大对手称作“公司 - 保守派联盟”和“自由派 - 劳工联盟”，因为“联盟”（Alliance）似乎比“同盟”（Coalition）一词更加准确。这一改变还可以使我们“同盟”一词用于国会中自新政以来就存在的两个重要投票同盟，“保守派同盟”和“支出同盟”。保守派同盟大多因累进税制、工会、政府对

商业的监管而形成，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该同盟在两大政党中都拥有极大的势力。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同盟中的南方成员逐渐向共和党倾斜，到21世纪头10年早期基本完成这一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今天的民主党已同过去完全不同，但是，党内仍存留着一批极端保守派国会议员，他们在限制工会、削弱政府监管等问题上与共和党意见一致，且仍须依靠反工会公司温和派获取大量经费。

至于国会中的支出同盟，一直以来它几乎完全根植于民主党内部。历史上，支出同盟通过为南方种植园主提供政府补贴来换取他们对全国的土地所有者和地产开发商所追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的支持。该同盟在近几十年内扩大了自己的支出目标，将大范围的教育与社会保险计划也囊括其中。

本书虽未深入展示大量历史细节，或是援引所有的案例和学术参考文献，但它并没有简化或遗漏任何核心思想概念。本书给出了基本术语的定义，对于初涉此领域的读者而言更加通俗易懂。有时它也会用人们熟悉的术语解释相关概念，但这些术语与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定义稍有不同。因此，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它展现了最新的研究发现和理论洞见。书中许多简单提及的问题在我撰写或合著的书中都能找到进一步的论述，这些书还援引了上千位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做的重要研究，正是这些研究让这本书的完成成为可能（例如，Domhoff 2013; Domhoff & Webber 2011; Gendron & Domhoff 2009）。在这一方面，本书开启了一扇通往美国权力领域重要学术成就的大门，这些成就是二战结束以来上百位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辛苦研究的结晶。

在结束这篇新序言之前，我想向全美各地的几位同事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他们提供的信息和反馈使我能够及时完成本书的修订。感谢阿米尔·艾哈迈德，她在作为遏制策略的选举规则方面有激动人心的新发现，并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些观点；感谢玛丽·亨德里克森、琳

达·洛鲍，以及詹姆斯·麦克唐纳（麦克唐纳是农业部经济研究所的一员，他为我提供了与农业和农业综合企业相关的资料与反馈意见）；感谢戴维·诺克对国家组织理论特性的概述；感谢杰夫·曼扎解答了我对投票和选举的困惑；感谢克雷格·赖纳曼对最高法院的深刻见解；感谢本杰明·佩奇提供的与公众舆论影响有关的重要文献；感谢彼得·菲利普斯提供的社交俱乐部的相关信息；感谢沃尔特·戈德弗兰克实用的修改点评；感谢亚当·施奈德帮助提供表格和数据；感谢乔尔·多姆霍夫的研究工作。我还要感谢理查德·L. 茨魏根哈夫特与我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他对前几章的修改建议。感谢为我提供宝贵反馈意见的书评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格雷格·安德拉诺维奇、米德尔塞克斯县学院的尼古拉斯·阿彻，以及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凯尔西·克雷奇默。

我要特别感谢北达科他大学社会学系的克利福德·斯特普尔斯，他对最大的 500 家公司、主要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研讨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网络分析，并慷慨地将他丰富的新发现与我分享，我在第二章和第四章引用了他的若干结论。斯特普尔斯的研究为证明公司共同体与政策规划网络如何与政府相联系奠定了更为可靠而有说服力的基础。他还针对第二章和第四章若干小节的内容提出了极有帮助的修改建议。

导 言

在美国，公司、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是否拥有过多的权力？自20世纪80年代起，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美国人（在2011年，这一比例为67%）对于此类问题的回答都是：是的。这本书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即便美国人拥有了言论自由、充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以及愈发平等的个人机会（这要归功于自由派人士所做的持续努力，他们致力于使每个人，不论他们的性别、肤色或性取向，都能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利和平等待遇），他们的回答依然是正确的。换言之，这本书试图解决一个表面上的悖论：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中，出身卑微但通过奋斗最终抵达商界、政府、大学及艺术界顶层的故事不胜枚举，为何会存在极端的公司支配呢？这一悖论更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在于，在其他许多民主国家中，公司并没有如此大的权力。在那些国家中，上层和底层人民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差距不像美国这么悬殊，而针对穷人、病人以及老年人的保障体系却更为强大。为什么和加拿大、西欧及日本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贫困状况却最为严重？为什么富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差距在1980年至2010年之间会变得越来越大？（Alvaredo, Atkinson, Piketty & Saez 2012; Bernstein 2000; Gallup 2011; Wolff 2012）

通过使用广泛的系统性经验结论，本书展示了大公司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富豪——是如何联手维护他们作为支配权力集团的核心地位的。他们的公司、银行以及农业综合企业形成了一个**公司共同**

体，在感兴趣的政策议题上左右着联邦政府，而这些议题同样会对其他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工作保障和福利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为夺取利益，公司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着竞争，这将在参与竞争的公司领袖之间造成明显而激烈的冲突，有时甚至要通过国会内部斗争来解决。然而，在影响其整体利益的政策议题上——这些议题常常因有组织的工人、自由派人士、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群体或强硬的环保人士发起的持续的政治挑战而遭受威胁——公司共同体总是异常团结。而在当选官员试图提高公司税率，或是针对商业活动出台新的规章制度时，公司共同体同样会更具凝聚力。因此，本书还讨论了另一个表面上的悖论：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由公司领袖组成的高度竞争性团体是如何在政治和政策领域通力合作的。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公司领袖拥有完全而绝对的权力，或是说他们在每个新政策冲突中的胜利都在预料之中，也不代表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之间，对消费者或环境议题感兴趣的律师和其他行家里手能够通过诉讼、游说或宣传手段迫使政府限制某些公司行为，甚至挑战整个产业。他们还成功地帮助那些因公司恶行而蒙受损失的员工和消费者争取到数百万美元，使得公司律师和共和党人最终推动了限制企业侵权责任方面的改革。此外，在工薪阶层的工人组织成工会并拥有罢工权后，他们的薪水和社会福利待遇都得到了改善。即使是最弱勢的群体偶尔也能够通过静坐、示威及其他制造混乱的方式为他们的不幸争取一些补偿。

此外，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是民权运动的又一大胜利，它开启了一个进程，使得由自由派美国黑人/白人/西班牙裔/亚裔组成的投票同盟能够在竞选领域对公司共同体发起挑战。虽然本书证明，公司共同体在20世纪60年代后变得更加强大（部分是因为极少数美国白人强烈抵制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带来的变

化)，但它还显示，限制公司权力的潜在力量也同时得到了发展。^{*}民主党逐渐从南方富豪以及城市民主党组织（在当时被称作“机器”，因为他们看起来强大而高效）的政治工具转变成一个由公司温和派、自由派、女性、有色人种群体、宗教自由派以及工会组成的政党。由此又出现了一个悖论：1965年至2011年，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之间的差异由42倍扩大到380倍，但支持进步性社会变迁的新的政治机遇仍然得到了发展（AFL-CIO 2012）。本书将对这些机遇的性质以及为何自由派-劳工联盟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做出解释。

部分因为公司富豪共享巨额的财富和共同的经济利益，部分因为反对他们共同利益的政治力量，公司富豪联合起来创建了自己的社会机制——封闭式小区、配有保安的公寓大楼、私立学校、排他的社交俱乐部、成人礼舞会以及幽静的避暑胜地。这些社会机制创造了一种社会凝聚力和一种群体归属感，即一种“自己人”的情感，并由此将公司共同体中的公司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塑造成**社会上层阶级**，这将在第三章具体阐述。此外，为弥补人手不足，公司富豪资助并掌控着多种多样的非盈利组织，如免税基金会、智库、政策研讨团体等，用来帮助他们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组织属于**政策规划网络**的一部分，通过共同的捐赠人、理事以及专家顾问联系在一起。政策规划网络中级别最高的员工，即各种组织的理事会成员，与公司共同体的领袖以及上层阶级共同组成了公司富豪的领袖团体。这些领袖被统称为**权力精英**，他们通过为由公司富豪控制的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效力而获得权力。权力精英的组成在第四章结尾处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解释。

* 对于社会运动最好的定义是：为改变既定的规章制度和习俗，通过非典型的、有时不守秩序的，且经常被视为违法的行动，长期挑战精英对手和当选官员的有组织的行动。社会运动的成员都是规则破坏者，虽然没有遭受过不公正对待的其他社会成员也认为这些人意图改变的法律和习俗是不公平的，这些规则如不允许非裔美国人在便餐馆就座用餐，不允许女性使用只对男性开放的大学图书馆，或者是因为人们的性取向而拒绝雇用他们等。因此，社会运动与新的政治运动截然不同。在政治运动中，自由派或极端保守派追求的只不过是赢得选举，而传统的“利益团体”则在遵守传统规则的同时，力求对自己关切的具体法规施加影响。

公司富豪还试图塑造民意，使公众舆论倾向于他们所拥护的政策提案，并反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舆论塑造网络**通常会利用政策规划网络中业已形成的政策立场、阐述以及报告，通过大公司的公关部门、一般的公关公司以及许多小型的舆论塑造机构进行运作，他们的注意力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产阶级志愿团体、教育机构以及大众媒体之上。舆论塑造网络虽然很少成功地改变公众舆论，但它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且能够声称：它确实改善了某些公司的形象，同时使人们对符合民众利益、原本条理清晰的政策变化产生疑虑和困惑。

公司富豪还进入了选举舞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向两个政党的候选人捐赠巨额竞选资金，而共和党赢得了一边倒的青睐。他们还通过为政治家（在他们供职于政府部门之前或之后）提供能够赚钱的演讲机会、游说工作以及公司董事会中的高薪职位等方式，间接地参与到选举之中。自从公司在 19 世纪 70 年代成为美国社会中的支配机构后，公司富豪的种种努力使总统和国会两院中的多数派都成为亲公司派。历史上，国会中亲公司的多数派组成了**保守派同盟**，即参众两院中的大多数南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立法提案上共同投票。（Shelly 1983）然而，《选举权法案》的颁布使这一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非裔美国人和白人自由派将最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士推向了共和党，同时，在众议院中，黑人立法者慢慢地取代了南方仅存的少数白人民主党人士，到 2012 年，他们已经在众议院占据了 21 个席位。^{*} 共和党内部，公司富豪与广泛的高

* 本书中，南方指的是 1954 年最高法院判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之前，州法律要求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 17 个州：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特拉华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马里兰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克拉何马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此外，除了西弗吉尼亚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以外，这些州在 1860 年都实行奴隶制。西弗吉尼亚州曾经属于奴隶制州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后来它从该州中脱离，在 1863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州，而俄克拉何马州在内战爆发时是奴隶制地区。这一定义强调，“过去的南方”比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它在人们心中的概念范围更广、势力更强大。而今天的“南方”指的是过去的“深南部”，这一区域包括得克萨斯州东部、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北部。

度保守派宗教组织在堕胎、校园祈祷、同性婚姻等各种社会议题上达成共识。**公司-保守派联盟**还吸纳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以及其他没有宗教归属的极端保守派反政府组织。与此同时，公司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在民主党中也占据很大的比重，他们为贝拉克·奥巴马 2004 年参议员选举以及 2008 年和 2012 年的总统选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支持。

公司富豪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策专家和政治通道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对联邦政府影响最大的力量。自 1985 年以来，来自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的领袖就一直被共和党 and 民主党政府委以行政部门的高级职务，而他们国会中的盟友则认真地倾听着他们的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研讨团体聘请的专家提出的政策方案。经济权力、政策专家和持续的政治通道三者的结合使公司富豪成为**支配阶级**，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完全而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塑造经济和政治框架的权力，其他群体和阶级必须在这一框架内运行，公司富豪还有权力改变与选举和选民相关的规定。因此，在涉及切身利益的议题上他们总是胜多败少。

尽管公司共同体中的领袖在联邦政府中拥有权力优势，且利用政府实施了许多必要政策，但他们依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因为政府具有潜在的独立性以及帮助公司共同体对手的能力。公司共同体中的领袖深知他们对政府的需要，但政府同时让他们感到畏惧。领袖们在经济危机中尤其惧怕政府，然而这也是他们最需要政府的时候。2008 年年末和 2009 年年初金融系统的几近崩溃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公司共同体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税收和政府支出上，但根本问题在于公司共同体与政府在重要权力议题上对支配权无休止的争夺。尤其是，公司富豪十分警觉于联邦政府能够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普通美国人：（1）为失业人员创造政府工作，这可能使人们不愿意接受私营领域低薪或危险的职位；（2）改善医疗保险、失业补贴以及社会保障待遇，这也会导致人们不愿意接受低薪工作；以及（3）帮助雇员争取更好的职场权利和保护，这将使公司富豪更难控制工作场所。

一般而言，公司富豪意识到，国会中的自由主义 - 劳工多数派能够使当前惠及各大公司的税务减免、补贴政策、研究拨款、政府采购以及规章制度发生改变。相反，自由主义 - 劳工多数派会将更多的税款用于学校、雇员持股公司，扶持可再生能源企业，提高对煤、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征税。他们甚至会支持将在市场上与私营公司竞争的公有控股公司。公司领袖清楚地了解这些可能性，因为某些情况在一两个州已经存在。比如说，北达科他州拥有一家州有银行和州有面粉厂（该面粉厂为美国最大），这是进步派人士在 1918 年选举后短暂控制州政府的成果。公司领袖还明白，自由派提出这些可能性是为了构建一个市场体系，以便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工人、环保人士以及小企业的利益（例如，Baker 2011; Carnoy & Shearer 1980）。

然而，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工会的任何支持都会遭到公司领袖的反对，他们把靠集体谈判协议实现的不现实的涨薪看作通货膨胀的主要起因。工会要求在职场规定和安全条例制定过程中拥有话语权也令他们颇感头痛。更严重的是，他们彻底反对作为潜在的组织基础的工会，因为工会拥护的一系列政策将削弱公司的权力。简而言之，在公司共同体眼中，**控制劳动力市场**才是关键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以及 2007 年年末大衰退突然出现的背景下，这些可能性在公司富豪眼中似乎变得格外真实。他们担心，政府领袖依靠纳税人的钱财将银行、抵押贷款公司以及汽车制造商从破产边缘挽救回来之后，这些机构将从此受到政府领袖的控制，尤其是民主党在 2008 年通过竞选掌控了白宫和国会的情况下。他们清楚政府救援和金融救助在过去就已经出现过——比如说，20 世纪 30 年代的银行、铁路和南方种植园，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的储蓄和贷款行业都曾接受过政府救助。但他们担心救助计划变得过于臃肿，延续时间太长，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与之前同等程度的支配权。他们的担忧虽毫无根据，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公司富豪密切地关注着政府的一举一动，任何与政府独立有关的蛛丝马迹

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应，每当被问及原因，他们总会大喊“社会主义”——他们用这一词语来形容强势政府对经济领域施加更多控制的现象，正如许多国家中利用市场体制的政府一样。*

公司共同体的主要敌人——工会、自由派大学团体、宗教自由派、大多数有色人种群体以及地方环保组织——有时会在一些政策议题上联手，组成自由派-劳工联盟。然而，这一联盟通常极难整合，因为它的成员在利益上存在分歧，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而且，和公司领袖相比，联盟能用于政治运动的经费少之又少，但这一差距已经有所缩小，因为（1）宗教保守派在一些问题上所持的极端立场令民主党对中上层阶级专业人士而言更具吸引力，而且（2）现在能够通过网络筹集小额经费。此外，虽然自二战以来，工会所代表的工薪阶层的人数比率不断下降，但是，它在2011年年末仍拥有1500万名会员（BLS 2012），仍然是联盟中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一部分。在超越种族和民族隔阂上，工会也比美国社会中任何部门做得都要好。

自由派-劳工联盟还包括了少数来自富裕商业家族的男男女女，他们虽然家境殷实，却对公司共同体持批评态度。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有时甚至是惧怕——共和党内部公司保守派与宗教保守派结成的联盟。有着优越社会背景的群体在自由派-劳工阵营中的存在表明，在政治取向的塑造过程中，将个体引向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的意外经历（如遭遇极端贫困、宗教不容忍以及宗族歧视时受到的震撼）与阶级同样重要。这一群体对公司支配的反对令权力平衡更加复杂：美国存在阶级支配，但并非所有上层阶级都支持阶级支配。

*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特点包括政府拥有所有创收资产的所有权，以及几乎不会依靠市场体制决定价格或消费需求的计划经济。西欧国家中，被美国保守派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几乎全部为私人所有制，且依靠着市场；这些经济体与美国经济的唯一区别在于，它们对某些公司行为的监管更为严格，对公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富人）征收的税款更为高昂，且拥有范围更广的、由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险系统（如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全民医保等）。这些国家被称作“社会民主国家”，与美国自由派想要实现的目标极其相似。

自由派-劳工联盟通过民主党中的自由派步入政治舞台，他们有时会派候选人参加党内初选以展现其政策目标，更常见的做法是发布蓝图规划，勾勒一个更为自由的经济，比如名为《繁荣经济》的小册子（Hacker & Loewentheil 2012）。与极端保守派刺耳的警告以及自由派评论家热切的期望相反，在国家层级上，自由派-劳工联盟在民主党内从未掌握主要话语权；由于南方富豪曾经是党内的关键组成部分，该联盟甚至一度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尽管民主党内部南方白人的离去创造了潜在的机遇，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内，工会领导和自由派人士的影响比他们此后任何时期的影响都要大。在20世纪90年代，工会投入上千万美元用于总统大选年的政治活动，到2012年，若将各个级别的政府都囊括在内，这一数字将达到几亿美元。他们还雇用组织人员和会员到基层工作，通过打电话、邮寄信件、挨家挨户宣传等方式动员人们投票。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就不断削弱，这不仅仅是因为成员的减少，还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各种议题上与自由派产生分歧，比如街区、学校、技术蓝领职业的种族融合；平权行动和用车接送外区儿童上学；职场女性问题；以及他们担心造成失业的环境保护法案。

自由派-劳工联盟有时会从政治左派那里获得组织技巧和社会运动技巧方面的帮助，后者曾作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进步时代”¹争取女性投票权、20世纪30年代建立产业联盟，以及20世纪60年代开展民权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那些现在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反资本主义者的左翼人士同样是自由派-劳工联盟的激烈抨击者，因为他们对显著改良基于市场的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表示强烈怀疑。他们还批评自由派只是将自己局限在改善代议制民主方面，而不是尝试推动参与程度更高的民主形式，使普通大众能够通过基

1 在美国历史上，“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是指1890年至1920年期间，美国的社会行动主义和政治改良纷纷涌现的一个时代。——编者注

层委员会以及其他当地组织参与到决策制定过程当中。此外，他们经常支持左翼第三党派，希望它们能够代替民主党，而这一策略遭到了自由派 - 劳工联盟的强烈反对。而且，他们中少数人相信，砸破橱窗玻璃、占领私人建筑、拆掉栅栏、与警察爆发冲突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这在 1999 年至 2001 年间反公司全球正义运动的示威和集会上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例如，Yuen, Burton-Rose, & Katsiaficas 2001; Yuen, Burton-Rose & Katsiaficas 2004）。这些分歧造成的结果是，同共和党公司 - 保守派联盟内部存在的差异相比，自由派 - 劳工联盟与各种左翼团体之间的隔阂更大，更具有争议性。

公司共同体与自由派 - 劳工联盟之间的主要政策冲突最好被描述为**阶级冲突**，因为它们关乎工资与利润的分配、税率与累进税制、工会的作用以及商业受政府管制的程度。自由派 - 劳工一方希望公司向雇员支付更高的工资并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款。它希望政府能够对广泛的商业活动加强管制，帮助雇员组织工会。公司共同体中大多数人都对这些政策目标表示反对，声称它们危及个人自由、市场的有效运作以及经济发展。这些分歧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得以体现：职场保护、罢工、全产业联合抵制、城市内大规模示威、对国会施压以及投票偏好。

自由派对堕胎、同性婚姻、枪支管理以及其他社会议题的支持遭到了强硬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由此产生的冲突并不是整体阶级冲突的一部分。它们属于不同的议题，与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关。（Lakoff 1996）它们也许还涉及截然不同的人生观，这些人生观反映了强硬自由派和强硬保守派的特性。（Tomkins 1964）这些差异不能简化为经济或是阶级结构，而且它们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社会议题（例如，Altemeyer 2006; Jost & Amodio 2012）。这些社会议题冲突的结果不会对公司共同体的权力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竞选舞台上，它们是公司 - 保守派联盟与自由派 - 劳工联盟竞争的重要战场。

为了使读者熟悉美国的六大政治取向，表 0.1 展现了宗教右翼、公